

#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摘要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摘要参考：弗雷德·布洛克：“导言”，见上书第10-27页；包刚升：《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4-21页。

## 波兰尼的论点：结构与理论（布洛克）

《大转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和第三部分聚焦于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的兴起、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以及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等这些事件的直接环境。在这些导论性和结论性的章节中，波兰尼构建起一个谜：为什么在欧洲，一段延长了的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从1815年持续到1914年——突然让位于一场尾随着经济崩溃的世界大战？第二部分——全书的核心——给出了波兰尼对这个谜的解释。通过回溯到19世纪最初岁月的英国工业革命，波兰尼表明了当时的英国思想家是如何通过发展出市场自由主义理论来对早期工业化困扰作出反应的，这种理论的核心信念在于，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从属于自发调节的市场。他解释道，作为英国“世界工厂”式领导地位的一个后果，这些信念成为世界经济的组织原则。在第二部分的后半段，即第十一章到十八章，波兰尼论证说市场自由主义产生出了一种必然的反应——以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为目的的不约而同的努力。这些努力的存在意味着市场自由主义无法像想象中那样运转，意味着统治全球经济的那些制度，在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制造了不断加剧的紧张。波兰尼追溯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崩溃的根源，并且表明，导致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乃是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组织全球经济这种企图的直接后果。第二次“大转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第一次“大转变”——市场自由主义——的一个后果。

在展开他的论证的时候，波兰尼仰仗于他对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广泛阅读。针对从15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事件，《大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看法；它也对如下这些广泛多样的议题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互惠和再分配在前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古典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把自然商品化所带来的风险。许多当代的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已经从波兰尼的论述中得到了理论启发。今天越来越多的书和文章通过对《大转型》的核心征引而得以成型。由于该书异常的丰富性，试图概括它的努力是徒劳的；这里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详细阐述波兰尼论证中的某些主要线索。但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重新组织他理论立场的独创性。波兰尼并不适用于政治版图的标准划分；尽管他同意凯恩斯对市场自由主义的许多批判，他也很难被看做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终其一生，他都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它与包括主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都有深刻的区别。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本身就与对这些概念的惯常理解大异其趣。

## 波兰尼的“嵌入”（embeddedness）概念

解释波兰尼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嵌入”概念。作为他对社会思想所作的可能是最为著名的一个贡献，这个概念同时也已经成为无数混乱的根源。波兰尼的论证起始于对下面这一点的强调，即直到当下为止，现代经济思想的整个传统都奠基于一这样一种概念——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连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即使是在经济学家承认市场体系有时需要政府来克服市场失败时，他们还是依赖于把经济视为经由有机整合的市场组成的均衡体系的概念。波兰尼的意图在于表明，这个概念与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现实的差距是多么大。他坚持认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嵌入”这个词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说的那样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波兰尼赋予这个术语的内涵超出了人们今天已熟知的那种理解，即市场交易有赖于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他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强调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尔萨斯（Malthus）和李嘉图（Ricardo）——与从前的思想家之间的根本决裂。和历史上将经济附属于社会的常规模式不同，他们的自发调节市场体系要求社会从属于市场的逻辑：他在第一部分中写道：“终极而言，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不过这个段落以及其他类似的段落本身导致了对波兰尼观点的一种误读。经常有人错误地认为，波兰尼的意思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兴起，经济已经成功地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

这种误读模糊了波兰尼论点的独创性和理论丰富性。波兰尼确实说过古典经济学家们想要创造一个经济已经有效脱嵌的社会，而且他们鼓励政治家们去追求这个目标，可是他同样坚持认为他们不曾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实际上，波兰尼反复说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建构；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例如，在第一部分的开篇他就写道：“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 为什么脱嵌（disembedding）不可能成功

波兰尼认为要想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成纯粹的商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在他眼中，自发调节市场理论家及其同盟者经常把人类社会推到悬崖边。但当不受限制的市场所产生的后果变得昭然若揭时，人们会抵制它；他们拒绝像旅鼠那样前赴后继地走向悬崖，自蹈死地。相反，他们会通过从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中抽身而退来挽救社会并使自然环境免于毁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让市场脱嵌就好比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让市场得到更大程度自治的努力同时也增加了张力的程度。随着进一步的拉伸，或者橡皮筋绷断——意味着社会解体——或者经济回复到更嵌入的状态。这项论证的根本逻辑在于波兰尼在真实的和虚拟的商品之间所作的区分。对波兰尼而言，商品就是那些为了在市场上出卖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根据这个定义，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是虚拟商品，因为它们最初生产出来并非用于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不过是人类的行为，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而现代社会中货币与信用的供给必然是政府的政策创造的。现代经济始于假设这些虚拟商品会像真实商品那样起作用，但波兰尼坚持认为这种手法会产生致命后果。因为这意味着经济理论的建立基于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恰恰使人类社会处于危险之中。

波兰尼的论证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一项道德论证：认为把自然和人类当成物品且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明显是错误的。这种想法亵渎了数百年来统治着社会的那些原则：自然与人的生命几乎一直都被认为有其神圣的一面。这一神圣的维度与将劳动力与自然从属于市场这种做法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波兰尼拒绝将自然当做商品来对待，这预示了当代环保主义者的许多主张。

波兰尼论证的第二个层面集中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即使经济被假定为自发调节，国家也必须持续地调整货币和信用的供给，以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危险。同样地，国家还要通过在失业期间提供救济，通过教育和培训未来的工人，通过试图影响人口流动等措施来管理不断变换的雇佣需求。在土地方面，政府已经通过使农民免于波动不定的收成和价格的压力而努力维持粮食连续生产。在城市地区，政府通过环境和土地使用法规来管理现有土地的使用。简而言之，管理各种虚拟商品的角色使国家置身于三种最重要的市场之中，维持市场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外在于”经济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可能。

虚拟商品解释了脱嵌经济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它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类型的技术或行政功能。当国家政策向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会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容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为了保证这些群体在承担这些代价的同时不卷入破坏性的政治行动，国家要花费更大的气力。这就是波兰尼宣称“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这一论断的部分含义所在：它要求通过治国术和压制来把市场逻辑及其所伴随的风险强加给普通大众。

## 追求不可能性的后果

自由市场理论家将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市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识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弹性的根源之一。因为诸社会无一例外地在全盘市场自发调节化的悬崖边上退缩了，所以它的理论家就总是可以宣称，任何失败都不是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缺乏贯彻它的政治意愿造成的。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由此就无法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它的鼓吹者也有了无懈可击的理由来为它的失败辩护。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下面这个最近的事例中：通过“休克疗法”将市场资本主义施加于前苏联国家。尽管这一努力的失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休克疗法”的辩护者继续将失败归咎于政客们太软弱以致很快就在政治压力面前缴械投降；认为只要他们顶住了压力，允诺中的、迅速转入市场能带来的好处就会实现。

波兰尼对经济脱嵌的努力的极端怀疑同样也是他关于“双重运动”的强有力论证的一个来源。因为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相反方向的抵制，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尽管工人阶级运动一直是保护性反向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波兰尼明确指出，社会中的所有群体都参与了这项事业。例如，当周期性的经济不景气破坏了银行体系的时候，商业群体就会主张强化中央银行，以使国内的信贷供给能够不受全球市场的压力。一句话，即使是资本家，也会周期性地抵制市场的自发调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也会努力参与旨在增加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各种保护性运动。

“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这一点，是波兰尼一贯的主张。他明确抨击市场自由主义者，后者指责说妨碍全球市场运行的保护主义壁垒的树立是一种“集体主义阴谋”的产物。与这一观点相反，波兰尼论证道，这些壁垒是自发和无计划的反应的产物，是社会所有群体对难以忍受的自发调节市场体系压力的反弹。保护性反向运动必须发生，因为一个脱嵌的经济会导致的灾难必须被阻止。波兰尼暗示，指向自由放任经济的运动需要这种反向运动来构成稳定。例如，当趋向自由放任的运动过于强大时，

就像1920年代（或者1990年代）的美国，过分投机和不断增大的不平等就会破坏持续繁荣的基础。而且，尽管波兰尼一般是同情保护性反向运动一方的，但他也同样认识到它有时会造成危险的政治经济停滞。他在对法西斯在欧洲兴起的分析中承认，当两种运动都无法解决危机时，张力就会不断增强，直到法西斯主义获得了攫取权力的力量，并与自由放任和民主同时决裂。

在对任何特殊时刻的历史可能性范围的想象上，波兰尼的双重运动主题与市场自由主义和教条马克思主义两者都形成鲜明对比。市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社会只能有两种真正的选择：市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尽管它们的偏好相反，可这两种立场在排斥任何其他可能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与之相反，波兰尼坚持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真正的可选项；它不过是一种乌托邦视野。更进一步，在第19章中，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这个定义允许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扮演角色。波兰尼认为，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许多不同的能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可以以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嵌入。确实，这些方式中的某一些会相对易于做到扩大产出和鼓励创新，而另一些则在将市场从属于民主指导方面更“社会主义”一些，但波兰尼暗示，既有效又民主的那些选择不管是在19世纪还是20世纪都是可能的。

## 全球政体的中心位置

然而作为一个老练的思想家，波兰尼当然不会去设想单个国家能够自由选择调和双向运动双方的方式。相反，波兰尼的论点之所以与当前的全球局势相关，恰恰是因为他把统治着世界经济的那些规则置于他框架的中心。他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论述，集中于国际金本位制与各国内部行动者能够采取的政治选择之间的冲突。想要理解波兰尼这方面的论证，要求简要涉及金本位制的逻辑，但这种涉及很难说是一种回归，因为金本位制的潜在目标仍旧对当代市场自由主义者具有强大影响力。波兰尼将金本位制视作一项非同寻常的智识成就，它是一种使自发调节的市场理论得以付诸实施的制度创新，并且，一旦被应用，它就有力量让自发调节的市场看起来像是出于自然。

市场自由主义者希望创造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国际上扩展市场范围的世界，但他们必须寻找出能让不同国家、拥有不同货币的人民得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他们推断说，如果每个国家都遵循这样三个简单的原则那么全球经济就能拥有完美的全球自发调节机制。首先，每个国家把本国货币的价值与固定数量的黄金联系起来，并保证以这个价格购入和卖出黄金。第二，每个国家都以其黄金储备的数量作为自己国内货币供给的基础，这样它的流通货币就会由黄金来支撑。第三，每个国家都尽力给自己的居民以最大的自由去从事国际经济交易。

金本位制为全球自发调节创造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机制。英国的企业能够向全世界各个地方出口货物和进行投资，充满信心地认为它们所挣的通货将会“像黄金一样好（good as gold）”。在理论上，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年份中由于它的公民在海外所花多于所挣而处于赤字地位的话，黄金就会从该国的储备中流出，来清偿外国人该得的支付。国内货币和信用的供给则会自动缩减，利率上升，价格与工资下跌，对进口的需求下降，出口于是变得更有竞争力。由此这个国家的贸易赤字得以自我消解。在没有政府插手的情况下，每个国家的国际账户都能达到平衡。这样，在不需要某种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将被统一为一个单一市场；主权仍旧独立存在于许多民族国家之中，这些国家的自身利益将会引导它们自愿采用金本位规则。

## 金本位制的后果

金本位制的意图在于创造一个整合的全球市场，这种市场将减少民族单元和国家政府的作用，但实行金本位制的真正后果恰恰与之相反。波兰尼指出，当金本位制在 1870 年代被广泛采用时，它产生了加强国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重要性的讽刺性后果。尽管市场自由主义者梦想一个太平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唯一一争斗仅仅在于个人和企业努力做得比对手好的那种竞争，但他们通过金本位制实现这些梦想的努力却导致了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

现实情况是，金本位制的简单规则将令人无法忍受的经济代价加诸人们身上。当一个国家的国内价格结构与国际价格水平不符时，这个国家应对黄金储备枯竭的唯一合法调节手段在于贬值。这意味着允许其经济不断收缩，直到下跌的工资把消费削减到重获外贸平衡的水平。这进一步意味着工资和农业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失业的增加、企业和银行的大量破产。

发现这种调整代价过高的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工商界自己也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几乎就在金本位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的同时，整个社会就联合起来努力消解它造成的冲击。各国首先使用的办法就是增强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保护性关税的使用。通过降低贸易流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各国在其国际贸易中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可预见性，并使自己在面临突然的和意外的黄金外流时不那么脆弱。

进一步的权宜之计在于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在 19 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争相建立正式殖民地的竞赛。自由贸易的逻辑曾经是反殖民主义的，因为如果开发出来的市场和投资机会被所有贸易者共享的话，宗主国在殖民地市场开发后得到的利益就无法补偿自己的殖民成本。但随着保护主义在国际贸易中的兴起，殖民开发的得失计算就反过来了。新获得的殖民地将得到帝国主义关税壁垒的保护，而且宗主国的贸易者将拥有获得殖民地市场和原材料的特权。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风（rush to empire）”加剧了英国和德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敌对，这种敌对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波兰尼而言，帝国主义冲动是不可能某些国家的基因密码中找到的；而是当各个国家面临金本位制无时不在的压力而努力寻找保护自己的途径时，帝国主义就出现了。从有利可图的殖民地流过来的资源可能会把一个国家从突然的黄金外流所造成的绞痛中拯救出来，对海外人口的剥削则可能避免国内阶级关系的继续恶化。

波兰尼认为，市场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倾向使他们发明出金本位制度，希望由此制度带来一个无国界的、不断增长和繁荣的世界。但事与愿违，金本位制度无止境的冲击却迫使国家通过不断加固的国家乃至帝国边界来巩固自己。金本位制继续对各国施加惩戒性压力，但它的功能却被从关税壁垒到帝国主义等种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严重削弱了。然而，甚至在这个完全悖谬的体系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崩溃时，它依然被视作当然，以至于政治家们也行动起来，致力于恢复它。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整出戏又再次悲剧性地上演了，各国被迫在保护汇率和保护自己的公民之间作出抉择。正是在这个僵局中，法西斯主义浮出水面。在波兰尼眼中，法西斯主义冲动——通过牺牲个人自由来保护社会免于市场的侵害——是普遍的，但地方偶然性决定了法西斯主义政体能否夺取权力。

## 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包刚升）

---

# 一、波兰尼的九个命题

卡尔·波兰尼开篇即说：“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本书论及的是这次事件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以及它所引发的巨大转变。……本书不是一本历史著作；我们所探求的不是重大事件令人信服的发生次序，而是从人类制度角度对这些事件的趋势做出解释。”《大转型》通常被视为一部社会科学著作，但由于《大转型》出版于1944年，该书从结构体系到写作方式都不是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方式展开的，加上该书涉猎深广、内容庞杂，想简明扼要地归纳出《大转型》的主要观点并非易事，而且任何简化处理都会引起争议。

即便如此，本文还是试图把《大转型》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命题的形式，以便提炼波兰尼的主要论点，并为本文的讨论确立一个起点。

## 命题一：19世纪文明的瓦解源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解体

波兰尼认为，19世纪的文明在西方历史上具有独特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与长期和平。这种文明基于大国间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和自由主义国家四个制度之上。其中，金本位制度是核心，金本位制度的源头又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体制的崩溃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瓦解与30年代整个人类文明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无形链环”，但根源则在于“自19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这导致了“1914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这里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是指基于自我调节市场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瓦解。

## 命题二：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在波兰尼看来，“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按照波兰尼的理解，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但“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他认为，管制与国家干预是自由市场兴起的前提条件。“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的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他还认为：“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

## 命题三：自我调节的市场试图实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因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于是，它们必须被组织起来在市场上出售——换言之，它们必须成为商品。”但波兰尼认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从本性上说就不应该是商品，三者商品化的后果是严重。他的结论是：“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

与之相关的是，波兰尼还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并未给普通阶层带来好处。“19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关于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与之相伴的是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波兰尼还用大篇文学语言来煽情地描述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兴起造成的社会悲剧，比如“冷酷无情的剥削者利用大众的无助，使他们处在牛马般的劳顿和饥饿之中”，等等。

## **命题四：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是19世纪的新生事物，而此前社会并非如此**

波兰尼认为，由市场控制和调节的经济所支配的社会类型是“市场社会”，而市场社会是19世纪的新生事物。“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哪怕仅仅在大致上，是由市场来控制 and 调节的。……市场在各个国家内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不重要的……”他基于对人类经济史的考察，反复强调市场社会作为新生事物的特殊性，即市场社会不同于此前任何的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在过去，商业和贸易从未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牟利亦未成为主要的动机。“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因此，正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的兴起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变迁构成了他所说的首次大转型。

## **命题五：市场社会的兴起是从市场“嵌入”（embedded）社会向“脱嵌”（disembedded）的转型**

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市场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关系。19世纪之前，人与人的市场关系不是主导性的。“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与市场关系相比，“社会连结的维系是命运攸关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分配中的秩序又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呢？主要而言，答案来自两个并非首先与经济相联系的行为原则：互惠和再分配。”当然，此外还包括自给自足的家计原则。波兰尼说：“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中的……”这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兴起之前社会形态的基本判断。

但是，他认为市场社会改变了这一切。“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

上述分析触及了波兰尼后来被广为引用的一个概念——即嵌入性（embeddedness），19世纪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兴起被他视为市场对社会“脱嵌”的过程。

## **命题六：自我调节的市场触发了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由此形成了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或双重运动**

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与工业革命促成进步的同时也促成了贫困化，比如，他同意“贸易和生产的巨大增长碰巧伴随着人类苦难的巨大增长”。自我调节市场的兴起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嵌入社会的状态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结果是“工业革命正在导致无比巨大的社会混乱”。因此，“如果听任市场经济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灾难。”

波兰尼认为，双向运动正是这种背景下兴起的。“19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成为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但是，一个深层次的运动已然形成，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虽然这种反向运动对于保护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相容的，因此，也是与市场体系本身不相容的。”这就是波兰尼的著名概念“双向运动”的由来。

## **命题七：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的双向运动引发了政治冲突，自我调节市场的失败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双向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政治冲突。波兰尼指出：“欧文没有预见到，他所呼唤的社会保护运动将被证明与经济体系自身的运转无法兼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那导致了深入骨髓的社会紧张的冲突……”这种冲突直接发生在不同阶级之间，冲突的源头在于不同阶级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保护两个维度上的不同立场。“广大的劳工阶级则对打破市场法（则）毫不畏惧，并公开挑战市场。”这样，经济领域的冲突演变为政治领域的冲突。“来自市场领域的紧张压力……延伸到政治领域，从而将整个社会都囊括进来。……在这个市场经济衰落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性地登场了。”

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关于选举权和民主政治的斗争。“宪章主义者为了权利而战，目的是为了阻止市场的磨盘继续碾碎人们的生活。但人民只是到了可怕的调整已经完成之时才被赋予这项权利。……（而）没有一个好斗的自由主义者不这样表达他的信念：大众民主对资本主义是种危险。”实际上，两者的冲突是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机制之间的对抗。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波兰尼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登场，是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僵局、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双向运动持续作用的结果。他说：“法西斯主义也根源于一种已经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

## **命题八：市场社会的终结不是指市场本身的消逝，而是指市场不再是自发调节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将实现去商品化**

波兰尼的主要批判对象是19世纪盛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亦即他定义的市场社会。他以模仿马克思的口吻写道：“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这里的旧世界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所支配的社会，新世界则是他所期待的新社会。波兰尼说：“在各国国内，我们已经在见证一种发展，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市场体系将不再是自发调节的了，即使是在原则上也不再如此，因为它已不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

同时，他还指出：“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逝。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

他在批判自由市场经济时还带有强烈的怀旧情结与道德色彩。实际上，波兰尼期待的新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市场不再由自发调节的机制所支配，利润与经济激励不再是主要动机；二是市场本身仍然存在；三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实现去商品化。他认为，很多人担心“把工业文明转移到一个新的、非市场的基础上，这太过于艰难，以至于无法设想”，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 **命题九：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社会保护和规制的强化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终结，反而是自由的重生**

总的来说，波兰尼认为，人们不必担心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以及社会保护和规制的强化会侵犯人的自由。一方面，他强调了权力和强制的必要性。“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从字面表述看，波兰尼也是个人自由的倡导者。他说：“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的权力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他还认为，计划与自由并不矛盾。“社会整

合的进展应该伴随着自由的增长，计划的发展应该包括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加强。”在讨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威时，他认为：“公民权利必须能够压倒一切权威……”

从字面上看，上面的表述似乎与波兰尼所批评的自由主义理论没有多少区别。但是，实质性的差异取决于波兰尼对自由的定义。他在界定自由时区分了“形式的自由”与“实质的自由”，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和个人保障意义上的自由，或者说区分了有钱人的自由与低收入者的自由。在他看来，在一个社会中，那些缺乏收入、闲暇与社会保障的人并没有拥有多少有价值的自由。他定义的自由是跟生产、交易与分配系统高度相关的，是跟人的收入与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的。他期盼：“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关于未来，他则断言：“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

总之，波兰尼《大转型》一书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上述九个命题。波兰尼自己则总结道：“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社会，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且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

## 二、市场、社会与国家的经济逻辑

就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批评而言，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波兰尼的《大转型》恐怕要算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了。

波兰尼注意到，自我调节的市场可能会导致社会灾难，并从社会保护对自由市场反弹的视角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从而提出了对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此外，双向运动和嵌入性等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市场、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福利国家研究、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互动研究等领域，波兰尼都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尽管如此，《大转型》并非一部逻辑严密和论证严谨的著作。波兰尼的很多观点在逻辑和论证上均存在瑕疵。第二节将从经济角度对波兰尼的若干命题进行学术分析与批评。

首先，波兰尼具有强烈怀古情结（worship of the primitive），而没有重视工业革命造成巨大变迁的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波兰尼的命题四和命题五跟这一问题有关。波兰尼的基调是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之前的文明形态不亚于、甚至要优于19世纪的文明——特别是如果不考虑物质进步，而更关注人的社会关系、安全与稳定及文化生活的話。

波兰尼在字里行间表露了自己的态度：原始文明似乎要优于工业文明，乡村生活似乎要优于城市生活，农业活动和松散的作坊似乎要优于现代工厂，非市场关系似乎要优于市场关系，甚至部落似乎要优于现代组织。一句话，传统的原始文明似乎要优于19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所塑造的现代文明。

波兰尼的文字还充满对前现代乡村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倾慕，对市场交易与工业革命带来的重大变迁则厌恶透顶。所以，他把工业革命说成“灾难性事件”，因为工业革命破坏了稳定的人际社会网络、乡村的传统秩序以及人们千百年来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甚至还败坏了人们的道德。比如，他曾提到：“淳朴的农民变成一群小偷和乞丐。”他甚至把南非原始部落卡菲尔人（Kaffir）形容为“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

但波兰尼的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比如，马克思就曾经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卢梭在很多著作中强调了原始文明的自然与淳朴，质疑科学进步与理性对淳朴状态与道德的败坏。如今，卢梭主义（Rousseauism）一词除了指代卢梭本人的学说外，另一含义就是指“回到更简单和更原始的生活方式”。

但是，波兰尼所倾慕的乃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和世界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一种估算认为：“在1700年前的100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只有0.11%，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在1000-1820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是缓慢的。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人均收入提高了50%。”按照他的计算，这820年中，西欧人均GDP的复合年增长率仅为0.14%，而全世界仅为0.05%。

不仅如此，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远非波兰尼所想象和描绘的那样安全、稳定和充满道德优越感，亘古不变的家庭结构与人际网络亦没有给人提供基本的所需和足够的便利。比如，公元1000年，人均预期寿命仅为24岁。从1000年到1820年，西欧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还时时受到歉收引起的饥荒、间歇性的传染病以及不同政治实体之间频繁战争的侵扰。

所以，与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苦难相比，此前是另一种社会苦难，只是波兰尼将其过分浪漫化了。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与技术进步、健康与寿命的提升、治安与秩序的改善都是过去的时代难以想象的。

另外，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所塑造的并非一个更缺乏保障和安全感的社会，而只是把过去基于家庭和邻里关系的互惠系统转换为了非人格化的交易与合作系统。

波兰尼怀古情节的另一面是，他认为19世纪的市场社会之前的社会是由“互惠、再分配和家计”所支配的，而非市场和利润动机支配。他认为，市场机制从来没有成为主要的规则。然而，波兰尼这种分析所忽视的基本事实是，18世纪之前的人类产出通常仅能维持个人与家庭的基本生存所需。这意味着他们仅有少量物品可用于市场交易，结果自然是市场交易占整体经济活动的比例不会很高。尽管如此，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市场和交易活动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早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商业和贸易活动对欧洲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商业与贸易的角色是一个渐变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的过程。

总体趋势是，前期相对漫长的缓慢变迁最终促成18-19世纪的“巨变”。所以，这并非如同波兰尼暗示的那样，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此前的社会中市场与贸易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内森·罗森堡等人指出：“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各种适应世界贸易扩张的制度也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这里不仅是市场交易量的增加，还有制度的变迁。“在西方，商业和商业制度的发展，是先于现代工业制造发展的。”正是市场交易的发展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先导。

至于波兰尼所强调的市场的支配性特征或市场社会的类型，与其说是自由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工业革命进展的产物。实际上，波兰尼在描绘前市场社会时更多是在描绘农业社会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征。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及社区关系等社会结构因素，到人的生产与居住方式，再到人的人格特质与心理结构，波兰尼更多地是在描绘了农业社会的特征，而未必就是前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特征。换句话说，即便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只要有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些传统也是要破坏掉的。

当然，工业革命本身的兴起是与自由市场制度密切相关的。如果着眼于长期，长达数十上百万年的人类经济史中只发生过两大重要事件：第一是发生在距今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第二就是工业革命。所以，波兰尼考察的事件本身就是人类经济史上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工业革命直接表现为机器对人工的替代，无生命动力资源对有生命动力资源的替代，以及矿产资源等新型原材料对动植物资源的替代。同时，工业革命还意味着工厂制度的兴起和生产组织的革命，人口的迁移集聚及城市革命的发生，人的社会网络开始脱离传统亲缘关系而进入非人格化的交易合作关系，随之而来还有生活方式和心理结构的巨大改变。

所以，对波兰尼所珍视的原始文明的破坏，主要是由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并非由自由市场制度本身所导致，而且这种转变是不可逆转的。

其次，波兰尼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导致了普通民众的贫困和严重的社会灾难，但这很难说是历史的真实情形。对于这一问题，波兰尼更多的是道德分析，而非经济分析。比如，他讲到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导致了对过去稳定生活的破坏及“流离失所”，但他并未充分剖析其经济逻辑。他对社会灾难的描述不是依靠系统的经验证据，而主要是文学描述。这就难以判断：英国或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在市场社会兴起前后究竟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认识到普遍贫困是前工业社会的一般特征，而非特例。物质的大幅增长和相对充裕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杰克·戈德斯通认为：“贫困问题在前近代时期（前工业社会）也是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欧洲、非洲还是亚洲，没有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缺衣少食的贫困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因而，普遍贫困本身并非工业革命的结果。相反，长期来看正是工业革命大面积地消除了贫困，并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所以，需要慎重对待波兰尼的命题三。

真正的问题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兴起的过程中，普通民众的贫困程度是否有所恶化呢？《剑桥欧洲经济史》相关专题的作者认为：“这一公认的基本观点是：总体上，这一时期（1750-1850年）的市场环境对劳动者一方不利，工资趋近于保持在或接近于贫困生存线的水平。”罗伯特·艾伦则估算，这一世纪中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多数地方的城市工人实际工资出现了小幅下降。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艾伦估计，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就出现了大幅上涨。《剑桥欧洲经济史》也支持这种观点：“大约在19世纪中期，在不列颠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实际工资与国民收入同步上升。”

从19世纪中叶到波兰尼出版《大转型》的1944年又过去了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这一世纪中英国和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已获得大幅提高。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效应是它不仅没有扩大贫富差距，反而有效地缩减了贫富差距。格里高利·克拉克的研究结论是：“在现代社会中，即便是税前收入的分配也要比工业革命前更公平。”

再次，波兰尼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正确的诊断，亦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波兰尼在《大转型》开篇即以“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的观点来批评自由主义。但实际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不认为，市场是不需要国家而能完全自我调节或自我运转的，他们都承认国家的必要性。这样，波兰尼的命题二就失去了意义。

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大量篇幅来讨论君主应该履行“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等三大义务。君主的三大义务，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或政府的三项职能。再比如，约翰·密尔（又译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集大成之作中，用整整一编来探讨“论政府的影响”。他分析了政府在保障安全与秩序以及制定与执行法律方面的重要角色，探讨了政府的一般职能与任选职能，强调了自由放任原则但同时阐述政府应当积极干预的诸种情形。因此，他们并没有否认国家的必要性，反而认为对市场体系来说一定的政府规制是必需的。

波兰尼反复提及的理论对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则这样说：“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没有强制措施，社会就会面临危险；为了保障人们的和平与合作，必须制定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必须保留暴力和威慑手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任何人破坏社会秩序。“因此，波兰尼树起的靶子——无须国家的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就失去了意义。

后来，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比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国家干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凯恩斯认为，政府具有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责任，在具体政策上他主张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非直接干预市场交易或实现要素的去商品化。毫无疑问，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规制与干预是以保护财产权利和市场自由为前提的。但是，波兰尼新社会的方案不仅包括市场不再由自发调

节的机制支配，而且还要实现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去商品化。

鉴于货币问题更为复杂，暂且不论。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去商品化的含义包括：诸种工作条件及“基本工作本身都不是市场决定的”；工会、国家、公众团体和“生产管理的实际组织”共同发挥作用；差别工作仍然存在，“但与直接货币收入无关的动机会比劳动的金钱报酬更为重要”。土地去商品化的含义包括：“把土地归属于去顶制度机构”，土地作为“基本要素被移除市场的权限之外”；“大宗的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的价格不再交给市场来决定”；“财产的性质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让源自财产权利的收入不再（no longer）不受限制地增长”。

如果要探讨这一方案的实质，波兰尼提供的是一个没有贴计划经济标签、却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方案——尽管这种计划经济并不等同于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波兰尼尽管同时强调这一方案“不意味着市场的消失”，但就其论述篇幅与重点来看，这都属于次要方面。

对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而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

波兰尼尽管说要保留商品市场、“保证消费者的自由”，但他认为应该严格管制乃至取消部分要素市场——至少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市场。照此方案，从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出发，完整的市场体系已经垮塌。通常认为，产权保护、财产制度加上契约自由、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原则。波兰尼的方案并不是要在尊重市场经济两大基本原则基础上强化政府规制或宏观调控，而是确定无疑地会破坏这两大基本原则。所以，既要按照波兰尼的方式进行规制和实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去商品化，又要保留市场的基本功能，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两者必定会发生冲突。

从整体视角来看，波兰尼更重视市场与经济活动的社会后果，以及人在市场条件下的安全与保障。这一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波兰尼整体上的弱点是几乎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的因素——后者一般被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自斯密以来的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重视激励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而波兰尼的方案基本上忽略这一问题。如果不考虑激励因素，甚至基本取消利润动机与经济激励，波兰尼的新社会方案又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改善经济绩效呢？

这也是波兰尼新社会方案的最大挑战。所以，波兰尼命题八是难以成立的。

最后，从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的实践看，很难给波兰尼的理论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政策，在波兰尼1944年出版《大转型》之前已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从1944年到现在的变动程度亦很大。20世纪30—60年代是凯恩斯崛起并逐渐盛行的时代，与福利国家有关的社会政策也不断扩张。但是，70年代以后，由于上述政策导致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新（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复兴。从最近趋势看，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批评，但新自由主义仍然主导着当前欧美发达国家的基本政策。加勒斯·戴尔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他（波兰尼）去世，《大转型》中提出的理论并不符合现实：尽管出现了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但资本主义达到了其有史以来的最大繁荣。”

即便在金融危机之后，“2011年，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意识形态依然是支配性的”。自从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兴起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的总体趋势是国家扩张了，政府规制强化了，社会福利政策扩大了，宏观调控政策加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波兰尼的理论得到了验证或者他的政策得到了应用。相反，很多实践都驳斥了波兰尼的理论。比如，很多政府规制不仅不是反市场的，而且是强化市场的；国家尽管扩张了，但总体上并未破坏既有的财产制度和市场制度；标志着社会保护的福利政策并没有采取介入生产领域，而是致力于通过再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

汉内斯·拉切尔这样批评波兰尼：“（二战后）资本主义从它的制度以及它积累和社会对抗的逻辑两方面都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但是，没有一种转变应该被理解为哪怕是部分地实现了卡尔·波兰尼关于经济会‘重新嵌入（reembedded）’社会的愿景。实际上，我认为波兰尼所预测的大转型从来就没有发生。”

所以，欧美发达国家战后的经济与政策变迁，不应该被理解为波兰尼意义上的市场从脱嵌到重新嵌入的过程。最直接地说，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等基本要素的去商品化根本就没有发生，利润动机与经济激励仍然是市场的主要驱动因素。

同样重要的是，即便是这些做法——这些做法离波兰尼的主张还相距甚远——都已经导致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政府干预、福利政策和宏观调控在试图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新问题。所以，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放松管制、去福利化和强化市场力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改革的主流。

### 三、市场、社会与国家的政治逻辑

与经济分析相比，波兰尼《大转型》的政治分析就更为薄弱。该书被布洛克等人高度评价为“超越经济主义的谬误”，引入了“整体性社会科学的框架”。但是，政治分析的欠缺，使得波兰尼这样一个充满实践关怀的经济社会学家，实际上无力对他提出的问题提供完整的理论解释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波兰尼尽管提到了社会保护的反弹容易导致政治冲突，引发阶级政治的登场，以及造成自由市场与大众民主之间可能的对立，但《大转型》并没有对此进行多少政治分析。就这一论题而言，基本的政治分析至少应该包括两个问题：第一，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将会触发何种政治过程？这种政治过程的逻辑是什么？第二，波兰尼的新社会将经由何种政治路径得以建设？新社会的政治逻辑是什么？但波兰尼并没有展开论述这两个问题。

如果存在波兰尼意义上的某种新社会的话，新社会一定是通过政治手段来建设的。所以，对一个严肃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言，脱离了实质性的政治分析，理论构建无异于空中楼阁。由于忽视了对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双向运动的政治分析，使得波兰尼的命题七充满了争议。

波兰尼分析框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保护机制在政治上何以可能？他论述的是社会与市场的关系。但是，社会是什么呢？社会如何采取行动呢？社会保护的反弹又如何转换对市场的规制呢？实际上，这种反弹最多只能表现为政治冲突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社会本身无法规制市场，而只有国家（或政府）才能规制市场。但是，国家与社会是两回事。那么，国家又是什么呢？国家能代表社会吗？这些只有借助政治分析才能回答。

如果引入政治分析，波兰尼分析框架中的“市场-社会”模型应该要变为“市场-社会-国家”三方模型。在政治分析中，国家通常都居于核心位置。但国家并不天然地偏向社会，国家既有可能偏向社会，又有可能偏向市场，甚至还有可能偏向国家本身——基于国家理论的视角，国家完全可能脱离社会与市场而扮演一个自主自为的角色。再进一步说，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国家既可能扮演保护社会的角色，又可能扮演侵害社会的角色。假定社会保护机制只有借助国家力量才能建立起来，那么国家介入社会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是否会强化社会保护机制呢？

道格拉斯·诺斯和玛格丽特·列维都把国家视为一个寻求租金最大化的统治者，安东尼·唐斯和詹姆斯·布坎南都把政治家和官员视为寻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如果这种视角值得借鉴的话，那么何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能够促使国家提供社会保护而非侵害社会呢？

如果不能回应这些关键问题，波兰尼希望强化对市场的规制和提供社会保护的主张就缺少政治基础。更直接地说，波兰尼并没有一个相应的国家理论来支持自己的分析（命题六）。

另一方面，波兰尼把加强规制作为促进自由的手段，但加强规制可能侵害自由，这取决于以何种方式加强何种规制。上文已指出，波兰尼论述了加强社会保护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充分论述这样做的途径和手段。实际上，这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国家主导的以强化集体控制的形式来实施。除此以外，人类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别的方法。这就驳斥了波兰尼的命题九。

政治学的常识是，国家提供的安全与秩序乃自由存在的必要条件，而19世纪的英国及欧洲发达地区基本已做到这一点。如果把自由定义为免于强制、免受专断权力之侵害的话，国家主导的集体控制的强化几乎注定会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甚或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罗伯特·诺齐克就十分警惕类似波兰尼的方案，他说：“我们关于国家的主要结论是：能被证明为正当的就是一种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即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有限功能的国家；更多功能的国家（extensive state）都将被证明为是非不正当的，因为这样的国家会侵犯到个人不被强迫从事某些特定事情的权利……”

上文已提及，波兰尼所定义的自由是跟生产、交易与分配系统高度相关的，跟人的收入与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这种自由主要不是指免于强制的自由，而是跟免于物质匮乏有关的自由。但是，大量相关研究认为，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与个人保障意义上的“自由”，或者说免于强制的自由与免于物质匮乏的“自由”，两者是容易产生冲突的。换言之，当试图实现更大程度的后一种“自由”时，就或多或少会破坏前一种自由。

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同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已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论述。他甚至警告，任何允诺此种“新自由”的道路到头来可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从波兰尼的新社会方案来看，上面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他的新社会方案包括了对财产权利、对经济自由、对价格体系、对生产组织的大幅度集体控制，这样做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会大大压缩法律意义上免于强制的自由。从政治层面说，上述两种自由可以兼容只是一种幻觉。

波兰尼对自由问题的政治分析不足，还表现为他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和浪漫主义上。他在《大转型》的最后一段以无比憧憬的口吻说：“只要他是真诚地（true）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fear）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这正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涵义，它给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确定性。”

波兰尼这里使用了“真诚地创造自由”、“无须惧怕权力”等带有十足情感色彩的表述，但这些情绪化表述的背后缺乏政治分析的支撑。另外，确定性一词流露出波兰尼对市场风险的厌恶和对不确定性的抵制。确定性固然意味着更多的保障，但同时又意味着更多的控制。无论采用何种说辞，这里的控制最后不免沦为国家主导的某种集体控制的形式。如果进行政治分析，就会发现波兰尼的自由概念及其新社会方案，很可能埋藏着通往极权主义的种子。

总之，上述两个部分已经对波兰尼的关键命题进行了讨论与批评。如果上述讨论与批评能够成立，那么波兰尼《大转型》一书的逻辑链条已出现很多断裂，全书的主要观点就很成问题。